

《歌林拾翠》刊刻年代考论

——兼论奎壁斋郑元美的刊刻活动时间

尤海燕

《歌林拾翠》，全称《新镌乐府清音歌林拾翠》，是目前所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明清折子戏选本之一。折子戏选本虽为片锦碎玉，但在保存戏曲资料，展现明清戏曲的发展流变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许多戏曲全本已佚，只有一些片段保存在各种折子戏选本中，使后人得以揣测其全本的大致面目，是研究戏曲的宝贵资料。即以《歌林拾翠》来说，其所选《百花记》在远山堂《曲品》、《曲录》、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中均有著录，现昆剧舞台上尚有《赠剑》等出^①，但此剧全本早已失传，只在《歌林拾翠》、《时调青昆》、《醉怡情》等几个明清折子戏选本中有零星收录，其中《歌林拾翠》收录十二出，是目前发现保存《百花记》最多的本子。

不过，明末清初折子戏选本多为坊间刊刻，众所周知，坊刻以营利为目的，少有精良之作，编者、刊刻者、刊刻时间等各类信息常不完整或不确切，这就给研究此类资料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扰。在对古籍资料进行研究时，首要的事情就是弄清刊刻时间、刊刻者等版本方面的信息，否则就难以以此立论。比如《歌林拾翠》，全书有十九处牌记，但都是有刊刻者而没有明确的刊刻时间，因此很难在研究中对其作戏曲史学的判断和描述。本文试图通过对其刊刻者刊刻活动时间的研究考证，解决《歌林拾翠》确切的刊刻时间的问题。

《歌林拾翠》分一、二两集，卷首题“绣像歌林拾翠初集”，“宝圣楼梓”，有总目及精美插图。全书以剧目为序，每剧标题统一格式，如《新镌乐府浣纱拾翠》、《新镌乐府幽闺拾翠》等。每剧选出在三出以上，篇幅较为庞大。每剧均有独立目录，牌记即附于独立目录后。举例来说，《新镌乐府浣纱拾翠》目录后有牌记曰：“岁在己亥吉月金陵奎壁斋梓”，《新镌乐府千金拾翠》目录后牌记是“岁在己亥吉月金陵宝圣楼梓”。据牌记内容来看，刊刻者不仅有卷首的宝圣楼，还有奎壁斋（郑元美）、大有堂；刊刻时间则大部分为“己亥吉月”，也有题“乙丑吉月”的。

^①庄一拂：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566页。

因为《歌林拾翠》牌记中只有干支纪年,没有朝代、年号记载,刊刻时间难以确定,大多数戏曲辞典、书目对《歌林拾翠》的解说都回避刊刻时间,而笼统以明人选编,清人刊刻概括之。如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“《歌林拾翠》”条云:“明人编选,其姓名不详……有金陵奎壁斋刊本(版片后归宝圣楼,封面改刻为‘宝圣楼’梓)”^①;《中国昆剧大辞典》“《歌林拾翠》”条曰:“昆腔剧曲选集。明无名氏选编。书名全题为《新镌乐府清音歌林拾翠》,有《善本戏曲丛刊》影印清奎壁斋覆刻本”^②;《善本戏曲丛刊提要》则认为《歌林拾翠》为“明无名氏编,清奎壁斋、宝圣楼、郑元美等书林覆刻本。”^③

从各方面迹象来看,可以肯定,这是个覆刻本。卷首总目刷出标题均为明末至清代常用的二字,正文中目录则为明代中后期常用的四字,这说明,总目与正文刊刻时间不一致,总目应是覆刻时后加的。十九处牌记有四处刻“宝圣楼梓”,一处刻“大有堂梓”,其余十四处为“奎壁斋梓”或“郑元美梓”。仔细观察,《歌林拾翠》的牌记都是竖排两行,每行六字,排列整齐,但《新镌乐府金貂拾翠》”后的牌记“岁在乙丑吉月金陵宝圣楼梓”,基本格式虽不变,“宝圣楼”和“乙丑”两处字迹却非常模糊,字形也比牌记中其他字大,很明显和牌记中其它字不是同时镌刻的。另外三处“宝圣楼”也都字迹不清,字形不正,放在牌记中明显与其他字不齐。显然,是宝圣楼覆刻了奎壁斋的版本,并把牌记挖改成自己的名字。或许是挖改十九处太过吃力,这一工作只做了四处就结束了,而挖改时间应该就是和“宝圣楼”三字一起出现在牌记中的“乙丑”年。至于“大有堂”,或许是和宝圣楼一起进行再版工作的书坊。《中国版刻综录》中记载“秣陵周氏大有堂,万历间刊《皇明宝训》四十卷”^④,但关于“大有堂”的记载极少,仅此一条,很难遽下论断是否就是《歌林拾翠》牌记中的这个“大有堂”。奎壁斋(郑元美)一直和“己亥吉月”同时出现,可以判断,《歌林拾翠》就刊刻于明末清初的某个“己亥”年。

明末清初的“己亥”年有万历二十七年(1599),顺治十六年(1659),康熙五十八年(1719),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……到底应该是那个“己亥”年呢?笔者以为,这个“己亥”应是顺治十六年(1659)。理由如下:

其一,根据《歌林拾翠》所收剧出,可排除万历“己亥”的可能性。《歌林拾翠》收录有周朝俊的《红梅记》。王穉登曾作《叙〈红梅记〉》曰:“己酉秋,余复有西湖之游,宿昭庆上人房”,在此,他结识周朝俊,“余次过其寓中,见几上

①齐森华、陈多、叶长海编: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7年,第641页。

②吴新雷主编:《中国昆剧大辞典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919页。

③王秋桂主编:《善本戏曲丛刊提要》第二辑,台湾学生书局,1984年,第9页。另据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(瞿冕良主编,齐鲁书社,1999年),郑元美即书坊奎壁斋的主人,此将郑元美和奎壁斋作为两个刊刻者并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
④杨绳信:《中国版刻综录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42页。

一帙,展视之,乃生所制《红梅记》也。循环读之,其词真,其调俊,其情宛而畅,其布格新奇,而毫不落于时套。削尽繁华,独存本色。嘻!周郎可为善顾曲焉……太原王穉登。”^①根据王穉登(1535-1612)生平,“己酉秋”当指万历三十七年(1609)秋天,也就是说,万历三十七年时,王穉登第一次见到周朝俊的《红梅记》,当时这个剧本尚未在社会上传播开来,那么《歌林拾翠》必选编于万历三十七年后,因此,万历二十七年的“己亥”(1599)可排除。

其二、根据笔者的判断,奎壁斋郑元美的刊刻活动集中于明天启后到清康熙前这一段时间,可排除康熙五十八年(1719),乾隆四十四年(1779)这两个“己亥”。

奎壁斋,又作奎壁堂,“明万历间金陵人郑思鸣、郑大经的书坊名,在状元坊”^②。从明万历间到清乾嘉间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中,郑氏家族几代人都在从事坊刻事业,刻印了大量书籍。奎壁斋刻书牌记多署“书林郑氏”、“金陵奎壁斋”,现已知姓名的坊主有“郑思鸣”、“郑大经”、“郑元美”。郑思鸣、郑大经出版刊刻的活动多集中在万历至天启间,比如明万历四十六年金陵书林郑大经奎壁堂刻《古今道脉》四十五卷^③、明天启六年书林郑大经刻套印本《诗经秘旨》八卷^④,明天启年间郑思鸣刻《急览类编》十卷^⑤等等。郑元美,生平不详。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其刊刻书籍的明确朝代(仅有干支纪年),对他的刊刻活动时间说法不一。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认为“思鸣字元美”^⑥,也就是说,郑元美就是郑思鸣;《中华印刷通史》第七章“清代的刻书事业”则提出:“奎壁斋主人乾隆时为郑元美,莆田人,到光绪年间书板已多散售易主。其所刻《易经》,版片售归金陵富文堂,光绪十二年(1886年)刷印时,封面改题:‘光绪十二年新镌,富文堂藏版’,而书内旧序末尾原刻:‘莆田郑氏订本,金陵奎壁斋’双行牌记仍然存在”^⑦。郑元美的刊刻活动时间如果能基本确定,那么《歌林拾翠》的刊刻时间就可以确定。而根据上文两书记载,郑元美或为万历时人郑思鸣,或为乾隆时人,莫衷一是。

首先我们可以排除郑元美是万历时人郑思鸣的可能性。上文我们已经论证,《歌林拾翠》只能刊于万历二十七年后,万历之后的第一个“己亥”是顺治十六年(1659),也就是说,《歌林拾翠》的刊刻不早于顺治十六年。如果郑元美就是郑思鸣,那么从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刻焦竑《养正图解》到清顺治

①蔡毅:《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编》,齐鲁书社,1989年,第1199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,第425页。

③翁连溪: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,线装书局,2005年,第134页。

④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,第53页。

⑤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385页。

⑥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,第425页。

⑦张树栋、庞多益、郑如斯:《中华印刷通史》,印刷工业出版社,1999年,第244页。

十六年刻《歌林拾翠》，中间有六十五年时间，即使郑元美长寿，从事长达六十五年的刊刻工作也是难以想象的。如果是顺治之后的“己亥”，那就更不可能。所以郑元美不是郑思鸣，他应该是郑思鸣、郑大经之后奎壁斋的经营者。根据上文所述，郑大经、郑思鸣一直到天启年间仍在刊刻书籍，那么，郑元美当是天启之后掌管奎壁斋的。郑元美刊刻过《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》（下文简称《广日记故事》）、《女四书集注》、《书经》等书，其中《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》正文首页标注：“琅琊王相晋升增注 莆阳郑鈗元美校梓”，由此我们知道，郑元美名鈗，字元美，这个标注从另一个角度证实郑元美不是郑思鸣。

从郑元美刻《广日记故事》、《女四书集注》等书来看，郑元美的集中刊刻活动不在清康熙、乾隆时期。一个重要的证据是，《广日记故事》、《女四书集注》完全不避康熙、乾隆的讳。《广日记故事》中有则故事“九岁通玄”，讲扬雄子扬童乌与其父共同探讨高深莫测的《太玄经》的事迹^①。全文共出现了四个“玄”字，既没有缺笔也没有用“元”字代替，可见郑元美刻书也不避康熙的讳；另有一则“射牛不问”：“隋牛弘（鹑觚人）性宽厚。弟弱，好酒，醉，射杀驾车牛。弘还，妻谓曰：‘叔射杀牛’。弘无所怪，直答曰：‘作脯’。坐定，妻又激之（以言语激发使怒），弘曰：‘已知之矣’。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（止也）”^②。此段故事共出现四个“弘”字，没有一个有缺笔等避讳现象，可见郑元美刻书并不避乾隆的讳。象这样不避讳的现象在郑元美刻的书里还有多处，如《曹大家女诫》“夫妇第二”：“……信天地之弘义，人伦之大节也（参，和也。弘，大也……）”^③，两个“弘”字亦不避讳……此不一一举例。在文网密集的康熙、乾隆时代，这样大量的触犯皇帝名讳的现象出现在民间普及读本《广日记故事》、《女四书集注》中，应该是不可能的。这只能说明，郑元美刊刻《广日记故事》、《女四书集注》不在康熙、乾隆时代。

从现有资料分析，郑元美很可能是自明入清之人。《广日记故事》、《女四书集注》的笺注者王相，明末清初人，在蒙学方面颇有建树，现在已知《三字经训诂》、《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》等皆其编定。《三字经训诂》刊刻于“康熙丙午年”（1666），即康熙五年，可知此年前后王相应该在世。另据《王节妇女范捷录》题注，王节妇“苦节六十年，寿九十岁。南宗伯王光复，大中丞郑潜庵两先生皆旌其门”^④。“宗伯”是古代对于礼部尚书的别称。在明朝，“南宗伯”乃特指南京礼部尚书，以区别北京的礼部尚书。此王节妇正是王相之母，旌表之

①《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》“神童类”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。

②《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》“友悌类”。

③《女四书集注》卷一《曹大家女诫》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。全书卷首题“金陵郑元美梓行”，每卷卷首题“琅琊王相晋升笺注，莆阳郑汉濯之校梓”，此郑濯之生平不详，或是奎壁斋郑氏家族另一成员。

④《女四书集注》卷四《王节妇女范捷录》。

时尚在明朝,所以王相定是自明入清之人。我们注意到,《广日记故事》标题云“奎壁斋增订评注”,而实际增订评注工作由王相完成,这说明是奎壁斋或者说是郑元美主持这次刊刻,并把具体编订任务交给王相,《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》是郑元美与王相合作完成的。可见,郑元美和王相是同时代的人,他应该和王相一样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动乱时代。《广日记故事》、《女四书集注》的刊刻应该是在清初顺治时期,这正是两书完全不避康熙、乾隆讳的原因。

综上所述,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和《中华印刷通史》对郑元美的记载均误。郑元美集中从事刊刻活动的时间应该是明万历后到清康熙前。至少,要活到康熙五十八年(1719)的“己亥”并且从事刊刻《歌林拾翠》的活动对于由明入清的郑元美来说是不可能的。同理,可排除乾隆四十四年(1779)。

从各种资料来看,奎壁斋在道光年间已然衰落。一者,各种书目中全然不见奎壁斋在道光年间刊刻书籍的著录;二者,现存奎壁斋版《书经》有京都善成堂翻版。善成堂是清道光年间北京琉璃厂附近有名的书坊^①。奎壁斋的版片落入善成堂手中,这说明至少在清道光年间,郑氏家族的刊刻事业已经后继无人,明末清初活跃了二百年左右的金陵奎壁斋在刊刻史上销声匿迹了。

综上所述,郑元美刊刻《歌林拾翠》的“己亥吉月”就是清顺治十六年(1659)。

或许正是因为郑元美自明入清,作为明朝遗民,对“清顺治”这样的年号一时难以接受,所以在所刻书籍牌记上索性不记朝代、年号,只写干支纪年了事。郑元美刊刻的时调小曲集《万花小曲》卷末牌记曰:“岁在丙申秋月金陵奎壁斋梓”,与《歌林拾翠》如出一辙。通过对《歌林拾翠》刊刻时间的考证可以推断,这里的“丙申秋月”应该是指清顺治十三年(1656)。另外,折子戏选集《乐府歌舞台》(全名《新镌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》)、《万家锦》(全称《新镌乐府名时曲万家锦》)亦为郑元美刊刻,虽然像郑元美刊刻的所有书籍一样没有具体的刊刻时间,但应该也是明末清初刻书,亦为戏曲研究之珍贵资料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①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,第596页。